

第一章 从增产节约运动到“三反”“五反”运动

20 世纪 50 年代发生的“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更是新中国乃至世界反腐倡廉历史中的成功案例。“三反”“五反”运动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取得执政地位考验的清醒认识,最初是由增产节约运动引发的。在逐步展开过程中,增产节约运动发展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富有成效的反腐败运动。

一、“三反”“五反”运动的性质

研究新中国高频腐败及其治理方略,不可忽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所谓“三反”是指 1951 年年底至 1952 年 10 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为此,195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2 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这场全国范围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反对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的运动,史称“五反”运动。

发动“三反”“五反”运动的初衷是什么?人们赋予“三反”“五反”运动什么意义?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可以从中获得什么启迪?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们认为,“三反”“五反”运动是由增产节约运动引起的,而增产节约运动的经济动因,是国家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中的经济财政方面的困难。保卫新兴的国家政权以及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旧中国没有给新政权留下优厚的物质基础,新政权获取资金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在国家机关、经济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中存在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为了增产节约,有必要开展反浪费、反贪污活动。在反浪费、反贪污活动中,发现浪费、贪污与官僚主义有关。官僚主义是贪污浪

费的温床。一些领导干部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对群众情况和具体实际工作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不愿意研究。还有些干部貌似辛辛苦苦工作,专门在一些次要的事务问题上,在次要的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不去抓工作的中心和问题的本质。有的干部业务生疏,高高在上,只知道“签名”和“盖章”。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在中央和华北局机关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报告中曾经提到典型的官僚主义的案例:中央贸易部在1951年向苏联进口治疗口蹄疫的药品三吨,“由于拟稿者的官僚主义,误写为三百吨,各级审稿、核稿、批准的负责干部也不加思索,照例签名盖章,结果多买了二百九十七吨。再如,天兰铁路某一段的定线设计,设计工程师们设计了十三条线路的方案,争执了一年之久没有结果,延误了工期。”^①所以,把浪费、贪污和官僚主义并列,构成了“三反”的内容。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揭发出党政军民内部的贪腐行为,大多与社会上的违法资本家相勾结。因此,要彻底进行“三反”运动,必须反掉资产阶级的“五毒”。“五反”运动是对“三反”运动的深化,对“三反”运动的对象和领域进行了拓展。“三反”“五反”运动从整体上已经超过了经济的范围,已经从实现增产节约计划的经济运动,发展成为一场整顿干部队伍工作作风,清除腐化分子,挽救和教育犯错误的干部,抵御违法资本家对国家干部的腐蚀拉拢,保卫和巩固新政权,保持政治清明的政治运动,成为移风易俗、清洗旧社会污毒的社会运动。

经济史学家往往从经济学的视角,比较注重“三反”“五反”的经济意义。但是,吴承明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1卷,承认“三反”“五反”运动超越了经济意义,认为“‘三反’‘五反’运动的根本目的是服从于增产节约这一更为广泛的群众运动”^②。而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或者专门研究新中国历史的专家们,则看重“三反”“五反”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将“三反”运动定义为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认为:“历时半年多的‘三反’斗争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是反腐败这一长期斗争的胜利的初战。”就其功能而言,“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对于

① 薄一波:《薄一波文选(1937—1991年)》,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② 吴承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1卷,423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作用。”^①可见,该书比较看重的是社会和政治意义,肯定了建构新社会政治形态的重大意义。与之相类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等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在比较重视这场运动的反腐败性质的同时,又延伸出来社会综合意义,认为1951年年底到1952年10月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洗刷了旧社会官场和社会上的污泥浊水,“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造运动。它们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移风易俗,起了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②这种看法,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1983年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的说法相一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认为:“三反”运动是指1951年12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从性质来说,是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严重斗争,也是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③

除了经济史家比较注重“三反”“五反”的经济价值外,比较多的学者们在肯定“三反”“五反”运动的反腐败政治价值的同时,又肯定了“三反”“五反”的社会价值。^④我们认为,这场斗争的最初的直接起因,来自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面临的经济财政困难。为了克服经济财政的困难,毛泽东和党中央号召增产节约运动。但是,增产节约运动本身的发展和后果,大大超出了经济范围。增产节约的大敌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必须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才能更好地实现增产节约的目的。这样,从逻辑上,增产节约运动注定具有反腐倡廉,追求清明政治,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保持国家稳定,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意义。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25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23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208~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④ 在历史学家那里,至少存在两个历史,一个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这是客观的历史,另一个是历史旁观者主观意图的历史,也就是历史旁观者描述的历史,这是主观的历史。主观的历史应以客观的历史为根据,离不开客观的历史,否则将成为随意编造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在人们的发现中获得主观的认可,离不开主观的存在,否则将成为僵硬的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历史事件具有多重意义,既有本意,也有在历史长河中凸显出来的意义。人们可能依据历史的需要对历史事件的本意,加以夸张、扩大而强调,也许淡忘、遗漏而使其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可以在历史事件的原有含义中,挖掘或者赋予新的意义价值,发现新的功能。而我们要做的,是按照“三反”“五反”的本来意义,挖掘其反腐倡廉意义,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增产节约——“三反”“五反”运动的最初动因

从客观的历史来看，“三反”“五反”运动最初的经济动因是国家为了解决经济财政方面的困难而发动的增产节约运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面对旧中国留下的经济凋敝局面，经济财政形势的困难，体会到治理天下的艰辛。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在给军队的一个指示中指出：“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负责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1950年10月1日回顾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时说：这一年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很困难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我国民生必需的粮食、棉花，不小数量历来是依靠进口的；水利事业遭到大破坏，年年受灾，而以1949年为最重；12年来的通货膨胀，在官僚资本的领导下，投机市场统治着工商业，人民日夜不安于通货贬值、物价飞涨。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一份遗产。另一方面，去年空前规模的革命进军，对于一切不再抵抗的旧军队与旧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很重的。不仅如此，铁路必须恢复，被封锁的上海必须支援，战争阻塞了城乡交流，税收甚微，支出很大，我们曾不得不暂时仍旧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其结果是，一方面解决了当时解放战争和重点恢复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仍不能避免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的局面。”^②在这里，陈云同志讲到了导致财政困难的两个主要方面的原因。

众所周知，新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从旧中国承接雄厚的物质遗产，反而不得不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穷困的烂摊子。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家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182～18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② 陈云：《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170～171页，载《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有学者统计,1840—1905年间的65年,发生了9次列强侵华战争,13年零3个月处于战争状态。据初步统计,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订立的条约、章程、合同和专条达300多个,侵占中国领土173.9万平方千米,相当于3个法国、7个英国。这几十年里,外国侵略者索取战争赔款、续城费、犒军费以及经济掠夺、战争破坏造成的损失等,总计约上千亿两白银。1931—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破坏,使得中国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约5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旧中国工业规模弱小,重工业尤其薄弱,钢的产量最高年份只有90多万吨。农业一直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国民党败退大陆,丧心病狂地炸毁工厂、矿井、破坏铁路、航运设备和水利事业。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比西方晚了100~200年。^①对于1949年中国的经济情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有一个基本的介绍:同旧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这一年钢产量仅15.8万吨,减少80%,煤仅3243万吨,减少48%,粮食为11318万吨,减少约25%,棉花为44.4万吨,减少约48%。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②

表 1-1 各国经济起飞期的人均资本

国家	起飞期(年)	起飞初期(美元)	1965—1969年(美元)
英国	1783—1802	183	2 018
法国	1830—1860	173	2 343
美国	1843—1860	451	3 995
意大利	1895	300	1 333
巴西	1933	144	323
阿根廷	1935	418	743
澳大利亚	1901	923	2 106
日本	1878—1900	158	1 207
土耳其	1937	171	331
中国	1949	50	

资料来源:根据胡鞍钢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0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整理。

① 参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第三章“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第三节“中国工业化的初始经济条件”,101~11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250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除了旧中国时代的国内外反动统治外,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财政困难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人民政府背上了把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职员全部包下来的负担。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社论中说:“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均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①1949年12月8日,陈云同志在全国税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供给人数已达750万人,明年预计达到900万人。其中包括接收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职员。”如果不养活这些人,简单地遣散回家,必然造成地方治安问题,没有饭吃,就会走上不正当的道路,就要骂共产党,就要惹是生非,“他们跑到地方上去闹事,我们还要派部队去剿匪,那末,至少要两三年弄得我们不安,这个担子放在背上卸不下来。因此,我们必须管他们吃饭。这是毛主席的正确政策,必须执行。”^②全面接收的政策,在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同时,加剧了经济财政方面的困难。1950年年初,全国军政人员达到900万人,财政开支浩大。

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经济恢复工作。1949年1月,东北地区开始普遍恢复经济,5月,山东解放区开始了这一工作。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长期战乱和反动政府的搜刮,基础设施和工农业遭到严重破坏,江河湖堤长期失修,水旱灾害不断,城市工矿设备残破不堪。经济恢复需要大量投资。仅水利工程,著名的就有根治淮河、修建官厅水库、荆江分洪等,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中开始动工和加紧施工的。1950年年底,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折合细粮897万吨。^③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中国人民迎来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需要建设数量众多的工程,建设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工厂,所需要的资金额度是巨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折合黄金7亿两。这就是说,当时中国拥有6亿人口,每个人要拿出一两多黄金作为国家建设之用。而旧中国经反动统治阶级的盘剥,是一个著名的穷大国。中国人民已经处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陈云:《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39页,载《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277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一穷二白”的境况。不要说培养建设工业化的技术人才,就是单单获得建设资金,也已经是横亘在我国工业化面前的一道难于逾越的壕沟了。

陈云同志在1950年10月1日回顾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时,我国尚未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6月25日,就在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做出大规模复员军队的十几个小时后,朝鲜国内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决定派兵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侵占台湾,阻挠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中国人民组织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0年10月19日入朝作战。这是一个贫弱的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农业国,与世界超一流工业强国、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之间的面对面的殊死较量。中国人民要赢得这场战争,是异常艰难的。战争意味着双方巨大的物质消耗。美国在这一时期运往朝鲜的作战物资达到7300万吨,直接军费消耗在200亿美元以上。抗美援朝战争给我国的财政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我们不得不加强国防力量,本来可以用在经济文化和其他事业的财力物力,不得不转向国防,财政概算的方针不得不“国防第一”。1950年国防费用达到28.01亿元,超支21.8%,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42.9%。这样的财政支出比例是必要的,是被帝国主义逼迫的。1951年,我们要进行抗美援朝运动,又要稳定市场,还要从事国家建设,其中,抗美援朝的开支十分庞大。陈云在1952年年初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说:“周总理讲过,抗美援朝的支出要占去年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把银行印发的钞票也算在内了。如果不把印发钞票算在内,那至少要占百分之五十七。我们面临着的敌人是头号的帝国主义,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我们所用的兵力远远超过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时用的兵力,前后达到一百多万。”^①1952年预算支出计划内国防费用占总支出的27.93%。

基础薄,国力弱,收入少,开支多的新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经济财政困难的局面呢?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筹集资金的办法,无非是剥削本国人民,依靠对于殖民地的掠夺,依靠战败国的军事赔款,依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让。这些办法,我国都不可能采取。我们筹集资金,增加生产是一个根本办法,勤俭节约也是一个好办法,这就是增产节约。

^① 陈云:《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322页,载《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中国共产党长期在艰苦的条件下干革命，搞建设也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节约搞建设。陈云在这方面有许多思想，1949年在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报告中说：政府正增加税收，决定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厉行节约，增加生产。1950年3月，他在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报告中说，要节约开支：“节约开支最主要的是要抓住这么几条，即一个人要顶一个人用，生产中不浪费，能不花的就不花，能缓办的就缓办。”^①把节省下来的钱和人力都用到生产上去。刘少奇在1950年的一篇当时没有发表的手稿中写道：“为了要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与加快工业化，就需要由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以投资于经济事业。”“中国人民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是能够用节约的办法由自己逐步地筹集起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的。”“在我们不饿不冻并能保持通常的健康的条件之下，我们尽可能地多节省一点，少花费一点，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来，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他还引用了斯大林的一段话用以说明不注意节约是不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斯大林同志说过：‘一个农民，他积累了少量的钱，他不用这些钱去修理犁头，革新自己的经营，而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花光了’。这样的农民，是不会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的。这对于我们的国家也是一样。如果能够从人民的节省中筹集一些资金以投资于工业，但我们却不这样做，而由大家在消费中花光了，那我们就不能创造人民的幸福的生活。”^②

毛泽东在1950年6月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报告，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③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1951年10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和研究了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与对策。毛泽东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会议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五条办法，其中的四条办法与节约有关：（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全国兵员从610万减至465万。（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预计1952年财政开支大于收入，将面临财政困难，要求各地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4）提倡

① 陈云：《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报告》，83页，载《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② 《刘少奇选集》（下），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25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节约,严禁浪费。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将抗美援朝与增产节约运动联系起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日报》在1951年11月20日发表题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社论,提出“‘增产节约’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普遍地深入地发动一个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②批评一些人把增产节约当成生产工作之外的临时任务,而把增产节约提高到“不只是解决某些困难的临时手段,而是建设人民国家的根本方法”的高度,提高到当时“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的高度,并提出增产节约应该从十个方面开展,包括杜绝基本建设中的浪费;减低成本;精简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编制;坚决反对贪污蜕化行为;在私营工商业和一般社会方面,提倡节约和俭朴,反对浮华和浪费,将节约的资金用于生产和流通或储蓄等。

可以认为,就全国而言,1951年10月是毛泽东号召的全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始时间。但是,就地区而言,1949年东北老解放区的劳动竞赛,是增产节约运动的先声。全国的增产节约运动最早是从东北开始的。

东北是老解放区,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在全国没有完全解放,党和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东北人民努力生产,承担着支援全中国革命的任务。1949年10月,东北地区的职工广泛开展了新的创纪录运动。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据不完全统计,创造新纪录的人数有5万多人。东北齐齐哈尔机床厂马恒昌小组率先向全国工人提出劳动竞赛的倡议。该小组在1950年改进工具15种,创造了5项生产新纪录,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1950年4月,全国总工会推广了马恒昌小组的经验,在全国国营工矿企业开展了学习马恒昌小组的活动。东北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48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② 《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0日。

地区处于临近朝鲜的地理位置,工业基础较为雄厚。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当然地成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可靠的后方基地。增产节约运动成为紧迫的重要任务。1951年5月18日,东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发表文章号召:东北工业生产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发挥工业的潜力,在争取完成1951年生产计划之外,争取1951年为国家增产和节约价值等于500万吨粮食的财富。

增产和节约价值五百万吨粮食的工作,首先是在工业系统开展起来的。1951年5月,工业部门的东北局城工会议提出“为增产节约五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口号。增产节约运动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热情,为了完成增产节约计划而学习技术,许多厂矿开展了群众性动脑筋、找窍门、挖潜力的合理化建议运动。1951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关于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中提出:“工业部所属厂矿一至八月在完成原定的计划之外,已为国家增产节约四百二十六万七千七百一十四吨粮食……工业部所属厂矿三十八种主要产品,九月份有三十五种超过了国家生产计划。沈阳十四个国营工厂,九月底已超过上级企业机构分配任务的百分之十;五个工厂九月份一个月完成的增产节约任务,等于前八个月全部完成数的三分之一。”^①

到1951年10月,企业厂矿所制订的增产节约计划,已经超过1千万吨粮食。东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在1951年10月26日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从9、10月各个厂矿增产节约数字逐月急剧增加的情况来看,整个计划是可能完成的,现在的奋斗口号是争取超过计划。”^②

增产节约运动继工业部门开展后,又在非生产部门中开展起来。东北局号召:一切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毫无例外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一切机关、部队、学校等非生产部门中,要运用工业部门开展这个运动的经验,认真进行清理资财、登记家务、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所属各厂矿职工,于9月底增产节约了价值六百八十万吨粮食的财富。该部写信向东北局报捷。东北局领导人复信说:希望你们不骄不躁为完成增产节约800万吨粮食的任务而奋斗。同时我也希望东北各

①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东北日报》,1951年10月28日。

② 高岗:《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27页,载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宣传委员会编印:《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宣传学习资料》,北京,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宣传委员会出版编辑,1952。